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 陕西实践与范式创新

周 峻 郭继荣

摘 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结合，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为破解全球可持续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理念与中国实践。现有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内涵阐释和话语体系构建，基于地方实践经验探索国际传播路径的研究探讨不足，特别是对地方特色传播价值的系统性挖掘尚显不足。本文立足陕西这一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基于其“生态兴则文明兴”^①的历史轨迹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陕西实践与范式创新。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国际传播 生态兴则文明兴 陕西实践

〔中图分类号〕G2；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51X（2025）04-0012-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②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指引着国内绿色发展实践，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东方智慧。推动这一思想的国际传播，有助于破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实践是讲好中国生态故事的重要支点。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历史发展轨迹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刻内涵。从古代农耕文明的水土养护智慧到新时代的绿色发展实践，这片土地始终在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本文立足陕西实践，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路径，为增强中国生态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参考。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价值与示范意义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生态系统的退化已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中华文明根基，汲取人类文明成果，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理念新方案。

【作者简介】周峻，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郭继荣，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710049。

① 习近平：《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第371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0页。

研究显示,地球系统已突破气候变化、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包括塑料在内的合成化学品、淡水消耗和氮的使用等6项临界阈值^①,这表明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本质上源于工业文明的认知缺陷。其一,机械论世界观将自然看作取之不尽的资源库,盲目相信技术可解决所有问题。其二,经济理性被简化为将GDP增长等同于社会进步。全球GDP的增长,伴随着年均2.3%的资源消耗增速(1974—2024年),且其中55%为不可再生资源,高收入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耗是低收入国家的6倍^②。其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凸显,把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当作组织社会关系的基础,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平等。最富裕的10%人口制造了全球约一半的碳排放量,最贫困的35亿人仅产生约10%的碳排放量,后者的生活却饱受超级风暴、干旱以及其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威胁^③。这种发展模式既违背生态规律,也背离文明伦理,预示着工业文明已走到历史转折点。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超越

西方生态理论虽然试图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危机,但其本质仍是资本控制主导,无法实现根本性变革。绿色资本主义代表了西方生态改良的主要方向,它试图通过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等给污染标价的方式,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寻找应对生态危机的出路,但现实中却暴露出该机制在生态治理中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且存在发达国家将减排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绿色霸权”的现象。稳态经济学作为西方生态理论的另一代表,虽提出限制经济增长的主张,但在实践中却面临难以克服的矛盾,即发达国家因人口负增长被迫鼓励生育,发展中国家则因贫困需要扩大生产,导致其“零增长”目标成为脱离实际的空谈。生态技术专利垄断进一步暴露了西方生态理论的资本控制本质,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封锁锁定绿色技术,发展中国家治污需支付高昂费用,拖累了全球生态治理的步伐。这些理论在本质上是对旧框架的修补,无法解决资源掠夺、南北不平等和增长惯性等根本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从根本上超越了工业文明框架,为人类文明转型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④理念,科学阐释了生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将生态环境从单纯的资源要素提升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证明保护环境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还能够创造新型经济价值。“两山论”强调生态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简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因此在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的支配。在认识论层面,“命运共同体”^⑤理念实现了对机械系统观的革命,打破西方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模式,建立起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整体观,其更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比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技术路径的依赖,这一理念更具系统性和变革性,为人类文明转型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这种战略定力的理论根基,这种理论创新不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修补,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原创性思想。

① 刘霞:《地球第二份“综合体检报告”出炉》,《科技日报》2023年9月19日,第4版。

②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4年全球资源展望:扭转趋势——资源使用量激增之下迈向宜居地球的路径〉政策制定者摘要》,国际资源委员会,内罗毕:2024年。

③ CHANCEL L. Global Carbon Inequality over 1990–2019 [J].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22, 11 (11): 931–938.

④ 习近平:《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35页。

⑤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第391页。

⑥ 习近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62—463页。

（二）西方生态治理困境与中国创新路径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西方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正面临深层次制度困境。

一是自由主义主导的环境政策在实践中暴露出严重弊端。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为例，2026 年将正式实施，覆盖碳泄漏风险高的水泥、钢铁、铝、化肥和电力五大行业相关商品的欧盟进口商需购买 CBAM 电子证书，证书购买价格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碳成本挂钩，但 EU-ETS 下却存在对高碳行业的免费配额，直至 2035 年完全取消。这意味着，2036 年前 CBAM 将与 EU-ETS 免费配额同时存在，免费配额是欧盟保护本土能源密集型行业的重要手段^①。这种机制名为环保，实则是发达国家利用规则制定权转嫁气候治理成本。同时，发达国家垄断清洁能源技术专利，发展中国家既面临高昂的技术转让费用，又难以建立自主技术体系，导致减排与发展的双重困境。

二是发达国家将环境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日益明显。仍以 CBAM 为例，其体现了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将气候议题与贸易政策相捆绑，并对不同国家采取差异化对待。这种做法极易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阻碍多边框架下气候问题的有效协商^②。这种做法背离了公平原则。气候资金分配严重失衡，2021—2022 年发达国家获得全球气候融资的 84%，最不发达国家仅获得 2%—3%^③。发达国家承诺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治理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实际到位仅约 614 亿美元^④。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损害了国际互信，不利于全球气候治理合作。

三是全球碳排放权分配存在严重不公。自工业革命以来至 2004 年，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量占全球 75%，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 4.2 倍^⑤，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相近减排责任。现行规则仅按当前排放量划分义务，无视历史排放差异，这实质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欧盟碳市场运行中，发达国家企业通过游说获取超额免费配额，发展中国家却面临更高合规成本。更甚者，碳市场金融化使交易沦为投机工具，部分国家通过碳汇市场低买高卖，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新型剥削。

相较于西方治理面临的困局，中国坚持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原则，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新方案。

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通过制度创新将生态保护纳入发展全局，建立全国碳市场等机制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协同推进，将减排与民生改善有机结合。截至 2023 年底，中国碳市场纳入重点排放单位 2257 家，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51 亿吨，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 40% 以上，累计成交量 4.42 亿吨，累计成交额 249.19 亿元^⑥，收入通过碳汇收益分配、扶贫专项、市场化生态补偿三类机制对脱贫地区进行支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的新路。

在责任分担方面，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主张在考虑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截至 2022 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较 2005 年下降 51%，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 17.5%^⑦，对比《巴黎协定》承诺目标，中国进展速率远超预期。

① 姜晶晶、陈光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分析》，《中国金融》2021 年第 20 期，第 83—84 页。

② 庄梓瑶：《欧美碳关税政策探析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国际商务财会》2025 年第 1 期，第 80—84 页。

③ 王旬、庞心睿：《全球气候投融资进展及展望》，《金融纵横》2024 年第 5 期，第 31—36 页。

④ 葛晓伟：《金融机构参与气候投融资业务的实践困境与出路》，《西南金融》2021 年第 6 期，第 85—96 页。

⑤ 何建坤、滕飞、刘滨：《在公平原则下积极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第 47—53 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https://www.mee.gov.cn/ywdt/xwfb/202407/t0240722_1082192.shtml [2025-8-11]。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3 年度报告》，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310/t0231027_1044178.shtml [2025-8-11]。

在技术合作方面，中国反对技术垄断，主张建立开放共享的绿色技术交流平台，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建设性参与南南气候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减排能力。

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倡导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通过建立国际绿色发展联盟等务实举措，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力。中国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可以相互促进，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选择。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时代价值

当今世界正处于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一思想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全新认识论基础，推动国际社会从工具理性向生态理性的根本转变。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生态话语的局限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破了单一发展模式的桎梏，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境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本质上是发展道路的重新抉择。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人类需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形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现代文明成果，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不是简单的环境保护理论，是涵盖价值理念、发展方式、制度体系的全方位变革，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系统性理论创新。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具有特殊价值。当前，全球环境治理面临公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方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表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认识为发展中国家破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两难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南南气候合作等务实行动，中国正在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这种传播不是强加于人，是通过平等对话、互学互鉴，促进各国探索适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必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这一过程不仅是环境保护经验的分享，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理念的重塑。中国将继续与各国一道，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家园。

（四）地方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立体支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既需要顶层设计的引领，更离不开地方实践的支撑。中国应发挥自身体制优势，构建中央思想引领、地方实践探索、国际转化推广的有机联动模式。地方实践探索要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立体支点作用。

一是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各地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治理经验。这种多样性既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因地制宜的智慧。从北到南，由东至西，各地根据自身特点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些实践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有机联系的整体，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同地域、不同学派都留下了宝贵的传统智慧。从儒家“天人合一”到道家“道法自然”，这些多元共生的思想瑰宝，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各地深入挖掘本土生态文化资源，让古老的智慧焕发新的生机，既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多元借鉴。

^① 《习近平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18年7月8日，第1版。

三是地方实践探索以其生动性和直接性展现出独特优势。这些来自基层的鲜活探索，为解决发展与保护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现实参照。在跨区域的生态实践中，中国通过建立科学的利益调节机制，为解决“谁保护、谁受益”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展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之道，为世界提供了参照。这种将理念转化为具体方案的能力，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协同发力可以提高传播效能。这种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传播模式，既确保了思想传播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又增强了实践案例的生动性和说服力，为全球提供更具示范意义的中国经验。

二、生态与文明关系的陕西诠释

陕西因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对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有着特殊的价值。在这片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的生态变迁与文明演进，生动诠释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规律，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陕西的经验表明，有效的国际传播需要立足中国文化传统，注重实践，通过实实在在的生态治理成效，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做出积极贡献。

（一）历史维度看陕西生态与文明发展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生态变迁与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刻真理。纵观三秦大地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环境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直接决定着区域文明繁荣程度。

汉唐时期的长安城，创造了当时世界城市发展的奇迹。研究表明，西汉时期长安城的人口规模已达到近50万人^②，其经济影响力巨大。这一繁荣景象离不开关中平原良好的生态基础，秦汉时期“八水绕长安”的水系网络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便利的漕运条件。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建设需求扩大，过度的森林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到东汉时期，渭河下游含沙量激增，形成了“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阨”^③，直接影响了长安城的可持续发展。唐代长安延续了这一发展规律。盛唐时期，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千米，人口近百万^④，经济文化繁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这与当时完善的生态治理体系密不可分，唐代建立了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设立“都水监”专司水利事务，并通过“禁山令”保护秦岭森林资源。但是安史之乱后，这一生态治理体系遭到破坏，关中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加速了唐王朝的衰落。明代初年的一段历史也值得深思。据《明太祖实录》^⑤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核心任务为考察西安是否适宜迁都。朱标实地勘察后，发现关中地区因长期战乱及生态退化，已呈现“山泽枯竭、民生凋敝”之状，若在此营建新都，将耗费巨额人力物力。朱标返京后，结合陕西经济凋敝、运输成本高昂等实情，上奏建议中止迁都计划。朱元璋权衡利弊，最终以“陕西劳费”为由，正式搁置迁都西安之议。需要指出的是，都城选址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生态条件在其中显现出显著影响。自明代以后，陕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明显恶化趋势。据文献记载，当时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第504页。

② 刘仰智、郭风平：《汉长安城与古罗马城粮食问题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36期，第16244—16246页。

③ 赵钧陶：《从生态环境视角看两汉都城迁徙原因》，《秦汉研究》2012年增刊，第300—307页。

④ 郭璐：《基于活动分析的唐长安地区空间界定初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7—161页。

⑤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太祖实录》红格抄本，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条，卷二一一。

秦岭一带森林资源已大幅减少，水土保持能力下降，导致自然灾害频发，陕西的经济地位也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下滑。这一现象表明，生态环境的变迁对区域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认识，任何文明形态都存在生态承载力的临界点。当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超过这个限度时，文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陕西的历史发展轨迹清楚地告诉我们，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文明繁荣的基础，破坏生态环境最终会导致文明衰落。这一认识为我们今天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二）传统智慧与现代理念的交融

陕西深厚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宋代“关学”宗师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以“乾乾坤母”的伦理观^①，与马克思“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②科学论述高度契合。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导下，陕西的传统文化资源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既传承了张载“民胞物与”的传统智慧，又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论述。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③，强调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科学论断在当代陕西的生态保护实践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陕西创新的“三长联动”（山长、警长、监察长）协同框架，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系统治理观与“天人合一”整体思维在方法论层面的有机融合。这一制度设计在传承传统生态智慧理念的同时，又将现代治理中的职能分工、法治保障等技术手段纳入其中，既避免传统治理中各自为政的局限性，又克服现代专业化分工可能导致的整体性缺失，体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理念的辩证统一。这种创新性融合形成三级治理逻辑，价值层面的生态优先、方法层面的系统协同、目标层面的民生平衡，为解决生态与发展矛盾提供了理论方法。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通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创新表述，既发展了自然辩证法，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范式。其理论生命力也在陕西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验证中进一步彰显，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深厚的生态文化底蕴。

（三）陕西实践展现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

陕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推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生态兴则文明兴”这一科学论断做出了生动注脚。

1. 延安退耕还林的生态富民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延安退耕还林工程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延安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黄土高原变成“绿色银行”，走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延安退耕还林工程创造了生态奇迹，累计退耕还林 71.83 万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 53.07%，植被覆盖度更是高达 81.3%；年入黄河泥沙量减少 88%，城区空气优良天数 315 天，扬沙天气降至 2.7 次；延安将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以苹果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富民之路；全市苹果种植总面积达 26 万公顷，年产量 350 万吨，已成为全国最大优质苹果基地，产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是对农民增收贡献最大的特色产业，占农民经营净收入的 60% 以上，延安实现整体脱贫，苹果产业功不可没；在农业发展上，延安大力开展治沟造地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在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 70 万吨左右，单产增长 1.6 倍；延安的畜牧产业、蔬菜产业、农产品加工产业也在退耕还林后高质量发展，成为农民增收

① 包庆德、冯超：《“民胞物与”：生存智慧及其生态哲学向度解读》，《思想战线》2025 年第 1 期，第 165—172 页。

②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2 页。

③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2 页。

的高效产业；现在延安城镇化率已达 62.3%，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园林城市。^①

这一实践证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仅能让人民群众感受自然之美，还能共享生活之美。延安经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2. 秦岭治理由乱到治的系统创新之路

秦岭生态保护工程开创性地走出了一条由乱到治的系统治理的创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秦岭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②

面对违建别墅侵占、非法采矿等历史遗留的生态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批示，陕西省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累计清查拆除违建别墅 1194 栋，收回国有和集体土地共 520.93 公顷，2020 年底，秦岭北麓矿业权全部退出，小水电站有序拆除，企业居民有序搬迁，全面完成生态复绿；经过系统治理，秦岭北麓生态修复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修复面积 2.88 万公顷，河道治理 542 千米；监测数据显示，区域植被覆盖度明显提升，年固碳量 620 万吨，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③ 通过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实现了从分散治理到系统保护的转变。六省一市签署了《加强秦岭地区跨区域生态保护协同合作备忘录》^④，推进跨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科学决策，推动建立秦岭生态保护监管协作网络，建立科学有效的科技决策咨询制度，支撑秦岭生态保护修复，打破了行政壁垒，形成了保护合力。在生态保护方面，秦岭珍稀物种栖息地不断扩大，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恢复。在民生改善方面，生态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在文化遗产方面，将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避免了单一保护模式的局限。更重要的是，这些实践培育了一批具有强烈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的“生态新人”，通过他们的示范引领，加速了全社会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生态公民”共识的形成，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真正落地生根。秦岭治理从乱到治的实践充分证明，严格法治和系统治理是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3. 榆林能源转型的技术突破之路

榆林作为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能源革命”^⑤ 重要论述精神，走出了一条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截至 2023 年底，榆林全市新能源并网装机总规模达 1714.85 万千瓦，占全省新能源装机总容量的 55%，年发电 236.22 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标准煤 725 万吨，能源转型成效显著。在传统能源升级上，榆林推动煤炭从燃料向原料转变，延长石油 50 万吨煤基乙醇项目采用先进技术，实现煤炭高效清洁利用；陕煤集团 DMC 项目突破甲醇氧化羰基化工艺，摆脱对原油依赖，预计年产值达 33.6 亿元；在深度降碳方面，通过“煤化工+氢”耦合技术，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绿色升级转型；CCUS 规模化应用利用地质封存优势，联合龙头企业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封存（CCUS），目标 2025 年实现年处理 545 万吨；新能源发展呈现蓬勃态势，依托丰富风光资源，榆林布局风电、储能装备制造产业，打造氢能全产业链；5 个增量配电改革试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新能源消纳。^⑥

① 边江：《实施西部大开发 圣地延安大变化》，《西部大开发》2020 年第 1 期，第 102—105 页。

② 习近平：《心有国之大者，当好生态卫士》，载《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年，第 208 页。

③ 李倩、李天一：《秦岭十年》，《中国自然资源报》2024 年 10 月 9 日，第 8 版、生态 3 版。

④ 《六省一市签署〈加强秦岭地区跨区域生态保护协同合作备忘录〉》，《陕西日报》2023 年 12 月 19 日，第 2 版。

⑤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581 页。

⑥ 闫景、马腾：《榆林：向绿而行“碳”新路》，《榆林日报》2024 年 1 月 27 日，第 1 版。

榆林实践表明，资源型城市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发展。这种转型不是对传统产业的简单替代，而是推动能源体系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变，为同类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①，榆林正在书写能源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朱鹮保护的文明传承之路

朱鹮保护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1981年陕西洋县发现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到如今种群数量突破4400多只，其重生之路，既是生态保护的典范，更是中华生态文化传承的见证；40年来，中国探索形成了“就地保护为主、易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的保护模式；洋县率先实施“四不准”保护政策，建立375平方千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恢复水稻田1.6万公顷；通过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旅游，当地农民年收入增加1500元以上，实现了“护鹮”与“富民”的双赢；朱鹮保护架起了国际合作桥梁，中日韩三国以朱鹮为纽带，开展14次种源交流与技术合作，日本出云市与中国汉中市结为友好城市，韩国昌宁建立朱鹮保护基地；舞剧《朱鹮》登上央视春晚，“朱鹮文化展”亮相G20峰会，这一生态使者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载体。^②

从濒临灭绝到振翅全球，朱鹮保护不仅拯救了一个物种，更传承了“万物并育”的东方智慧，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③，朱鹮的重生正是这一理念的鲜活注脚。

陕西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伟力，重塑了三秦大地的生态面貌，积累了宝贵经验，为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提供了丰富素材。

（四）陕西生态文明实践的国际传播支点价值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片土地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生态智慧，为解决当代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古代农耕文明到现代生态治理，陕西始终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这里既有历史积淀的生态理念，也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陕西的发展实践表明，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不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能够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创新路径。

1. 历史与现实对话中的文明延续性印证

陕西厚重的生态治理历史，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独特价值。这片土地上的古今智慧对话，展现了中华文明千年的生态智慧。

历史经验揭示了人类文明兴衰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周秦汉唐的生态实践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智慧。这些历史经验不是简单的过往记忆，是经过现代科学验证的宝贵财富。

历史的教训同样发人深省。明代建都选址的生态考量，以及后来因生态退化导致的经济发展困境，警示了后人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这些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当代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难得的长期观察样本。国际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面对气候变化等长期性挑战，需要借鉴这种跨越千年的生态智慧。

当代陕西通过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让积淀千年的生态智慧重焕生机。退耕还林工程既创新传统农耕方式，又传承“取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秦岭保护融合现代技术与古代“禁山令”理

① 习近平：《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人民日报》2014年6月14日，第1版。

② 杜尚儒：《朱鹮：从秦岭飞向世界》，《新西部》2021年第11期，第15—19页。

③ 习近平：《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第384页。

念，这种古今贯通的治理模式，为解决当今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视角。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彰显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自信。陕西经验表明，传统生态智慧经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可以成为解决当代问题的宝贵资源。这种基于文明传承的生态治理路径，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①

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陕西的历史底蕴具有特殊意义。它向世界证明，生态环境保护不是外来理念的移植，是文明基因的延续。这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觉，正是在全球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深厚的基础。

2. 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生态转型路径探索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特殊挑战。这些国家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需应对生态压力。陕西实践表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通过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完全可以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协同推进。这种转型的核心在于重构发展逻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环境从发展代价转化为发展基础，当生态价值被充分纳入决策时，保护环境反倒能催生新动能。这种认识论转变，为破解发展困境提供了思想钥匙。

陕西经验展现了系统性转型路径。生态治理不是孤立工程，是与产业政策、民生保障深度融合的整体设计。这种系统思维打破了西方“外部性内部化”的局限，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框架。特别是在制度创新方面，通过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实现了政策协同效应。

转型必须兼顾公平性。陕西强调生态治理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避免将成本转嫁弱势群体。这种以人为本的路径，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惠民、生态利民”^②的核心要义，既保障社会公平，又增强改革共识。相比之下，某些激进环保政策因忽视社会承受力而难以持续。

在全球气候治理背景下，这种转型更具战略意义。从延安退耕还林、黄河治理到榆林作为传统高碳区域向低碳化的转型，陕西实践表明，人均 GDP 1 万—2 万美元阶段完全可以实现碳排放强度快速下降，这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提供了现实路径。这种平衡发展所体现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智慧，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转型路径，正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最需要的转型指南。

3. 传统智慧现代诠释

陕西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所蕴含的生态整体观，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与哲学根基。这一跨越千年的东方智慧，与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陕西实践充分证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通过深入挖掘“关学”思想中的生态哲学精髓，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不仅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连接点，更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基础。

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陕西经验具有特殊价值。它既不是简单的文化输出，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接受，是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智

①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480 页。

②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 年，第 382 页。

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这种传播方式注重价值共鸣，强调互学互鉴，真正实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① 陕西的实践正是这一重要指示的生动体现，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启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核心是价值共鸣，不是技术移植。通过挖掘传统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我们正在推动一场深刻的文明对话。这场对话不仅关乎环境保护的具体方法，更是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整体反思，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共同探索。

这种传播方式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式，证明不同文明都可以为可持续发展贡献独特智慧。真正的绿色发展必须扎根文化传统，在传承中创新，在对话中共建。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② 陕西的历史与实践启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汲取各民族的生态智慧。陕西经验的价值不仅在于地域特色，更在于它展现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这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提供了范例。

三、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陕西路径与实践方略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关注。陕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史和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都具有独特地位，既承载着传统生态智慧的深厚积淀，又孕育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共生，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厚土壤。

（一）理论对话与传播创新的转化机制

陕西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探索出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相结合的特色路径。通过挖掘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智慧，陕西学者揭示了这一中华传统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联系。英国学者李约瑟的研究表明，张载的生态哲学比西方同类思想早四百年^③，这为理解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文化渊源提供了重要参照。

在传播方法的创新上，陕西的实践走出了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新路。在榆林治沙过程中，“光伏板上面发电、板间空地种牧草、板下种植中药材”，将“物质循环”原理变成了“一地三收”的生动实践。这种“把理论变成实景”的做法，让不同国家的参观者都能直观理解中国生态治理的智慧。

陕西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实践中，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具体实践案例，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④ 的全球治理观，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绿色转型提供了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实践经验。

（二）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

在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尽管其理念日益受到关注，但在国际层面的接受度和认同度仍面临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传播渠道有限、语言表达差异等表面问题，更来自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制度体系的不同。

① 《习近平的文化情怀》，《人民日报》2022年5月12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18年7月8日，第1版。

③ 方光华、曹振明：《张载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15、21页。

④ 习近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75页。

1. 生态文明的概念误读与翻译困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面临西方学者的理解差异。美国生态文明研究所（Eco Civ）的学者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和安德鲁·施瓦茨（Andrew Schwartz）在他们 2019 年出版的《什么是生态文明》（*What 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一书中，将“Ecological Civilization”理解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强调这是对工业文明的整体超越。但是，哈佛大学学者伊丽莎白·埃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在其著作中，却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描述为“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环境威权主义）。这种分歧源于术语翻译差异、概念理解偏差和意识形态影响三个层面。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要确保相关术语译法准确传达原意。其次是促进概念共识，通过哲学阐释帮助国际社会理解生态文明超越环保的文明意义。最后是减少意识形态干扰，区分学术概念与政治评价。只有协同推进这三个方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对话。

2. 中国与西方环境叙事的对比

中外媒体在报道生态议题时呈现明显的叙事差异。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中国媒体讲的是国家层面如何统一规划、协调行动、推动发展模式转变这样的大布局、大工程，讲政策和制度的建设。西方媒体常常更看重个人故事的力量，瑞典青年环保活动家格蕾塔（Greta Thunberg）在西方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媒体大量报道她的个人行动和个人形象，相比之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生态文明成就的报道少之又少，关注度也不在一个量级上。

这种差异本质上是西方“个体主义”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不同，研究表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可能更倾向于培养抽象、非情境化的自我表征，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则可能增强情境化、互依型的自我表征。这种文化差异可能体现在对个体能动性、与制度信任的权衡上，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对社会叙事的神经适应性调节^①。这种认知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各自讲述焦点的不同，本身就造成了沟通和传播的障碍。这也启示我们，在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需要在个体能动性与制度信任间寻找平衡点。

3. 国际学界如何看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升，需要学界全面推进。从学科比较视角看，环境类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跃度显著低于工程技术领域，中外学者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合作规模与深度也相对有限，这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跨国合作态势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学术交流的不平衡状态，客观上影响了国际学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度的理解。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现状并不意味着理论本身的价值不足，只是反映出跨文化学术对话需要更多桥梁。就像中国古语所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优秀的理念同样需要有效地传播。当前，国际学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具体政策层面，对其作为文明转型路径的深刻内涵关注不够。要改变这种状况，既要提高国际学术交流的主动性，也要增强理论阐释的穿透力，让世界更全面地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4. 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对话困境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对话交流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从实际情况看，不同国家对生态保护的理解各有特点。欧美国家习惯从技术角度谈环保，中国等亚洲国家则更注重从文明进步的整体来看问题。这种差异源于各自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实践，需要相互理解和尊重。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结构性差异客观存在，环境领域的学术讨论中，技术性议题往往占据主导，生态伦理等整体性思考的讨

^① 丁小斌、赵楠：《“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差异：来自基因、大脑的证据》，《心理与行为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131—137 页。

论空间相对有限。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长期形成的议事习惯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

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陕西榆林治沙就是很好的例子，最初外界了解不多，但通过实实在在的治沙成效和科学数据，最终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促进国际理解至关重要，关键要拿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果，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让世界看到中国经验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陕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方略

陕西在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方面，因其独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基因和丰富的当代实践成果，不仅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富素材，同时也肩负着特殊使命。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共同挑战，陕西应立足自身优势，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探索一条以文化为根基、以实践为支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新路径。

1. 认知维度的转译策略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离不开准确的术语转译，但当前专业术语翻译时容易丢失文化内涵。比如“生态文明”直译成英文后，很多外国学者会误以为只是中国的环保政策，却忽略了其中的哲学思考。

陕西在生态文明术语转译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作为中国西部教育高地，陕西拥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一批高水平高校，这些学校在哲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学科都有深厚积累。特别是陕西作为张载“关学”的发祥地，在生态哲学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张载创立的“气本论”哲学体系，将天地万物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一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的系统性、整体性高度契合，也与当代世界生态理论中“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遥相呼应。这种跨越千年的思想传承，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术语体系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源泉。

陕西高校在推动生态文明术语翻译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探索。例如，陕西师范大学的学者在《西铭》的新译与诠释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未来可从三个方面深化工作。一是系统整理传统生态术语。要梳理典籍中的生态智慧，如《周易》“生生之谓易”、《礼记》“草木零落”等概念，给出准确外文翻译和解释，还要注意翻译要区分学术与大众场合，提供多种译法选择。二是编写实用翻译指南。指南要总结翻译原则方法，既要提供正确译法，也要列出常见错误。可配多语言对照表和概念关系图，帮助外国学者理解中国生态思想的内在逻辑。三是深化国际合作。可与国际机构共建研究中心，举办专题研讨。探索中外双导师制培养学生，提供国际文件翻译实践机会，推动中国生态术语进入国际标准体系。

转译策略创新对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关重要。陕西高校应充分发挥优势，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做出贡献。

2. 平台维度的网络构建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需要构建稳定有效的交流平台。良好的平台能够促进思想碰撞、经验分享和务实合作，是连接中国经验与世界实践的重要桥梁。

陕西在这方面也具有优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在促进东西方文明对话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安拥有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址，为开展国际生态对话提供了高端平台。同时，陕西的高校集群中也有一批在生态学研究领域具有特色优势的高校，同时依托区域内信息技术学科的强力支撑，可为生态知识平台建设提供跨学科支持。更重要的是，陕西自身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活教材”，这片土地的历史轨迹深刻印证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发展规律，进入新时代以来的一系列生态建设成就，正是这一历史脉络下的最新篇章，展现了生态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目前，陕西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在近年欧亚经济论坛的生态议题讨论中，陕西学者主导的生态文明案例分享环节，吸引了多个国家代表的参与。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长期开展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变迁等研究，已建立国家级新区数据库。更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参与创

新的“光伏治沙”模式，通过可验证的植被恢复和碳汇数据，正在成为国际认可的生态治理方案。

未来陕西在平台维度可重点聚焦于知识共享平台建设上，可推动建设陕西生态术语库、可视化案例库、专家智库，并组建协作中心进行资源整合，提供在线联合研究工具。此外，人才培养要聚焦专业能力、国际传播能力和数字工具应用能力，为平台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通过强化平台建设，进一步增强陕西在国际生态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做出示范性贡献。

3. 技术维度的传播创新

运用新技术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突破口。短视频、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能够跨越语言障碍，直观展现中国生态治理成效，让国际受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中国经验。

陕西作为科教大省，拥有高水平信息技术院校，在数字建模、区块链等领域技术储备雄厚。同时，陕西丰富的生态实践案例，如朱鹮保护、秦岭修复等，为数字内容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更重要的是，陕西高校正推动技术与生态的交叉培养。近年来，陕西高校与研究机构在生态大数据领域开设了专项课程，并建立了数字化的生态监测实训平台，为相关技术传播与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撑。

目前，陕西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陕西高校与政府部门合作，通过三维建模研究朱鹮生态行为，为珍稀物种保护提供技术支持。“陕西文旅”自媒体账号推出的毛乌素沙漠治理内容获得广泛关注。西安外国语大学组织的国际学生生态短视频创作，正逐步扩大多语种传播影响力。

未来需要在以下方向实现突破。一是建设国际化的新媒体传播矩阵。重点打造在 TikTok、Instagram 等平台开设的官方账号，组建专业团队运营。传播内容要注重陕西生态案例直观展现、国际关注的环保议题、平台热点传播规律的“三结合”。可以邀请在陕留学生、外籍教师参与内容创作，用他们的视角讲述陕西生态故事。二是开发面向青年的数字产品。让“三维建模研究朱鹮生态行为”等停留在试验室里的成果真正“活”起来，运用 VR、AR 技术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使之成为青少年喜爱的数字产品。这需要组建跨界团队，让科研人员和传播人才一起工作。科研人员确保内容准确，传播专家负责形式创新。三是构建国际创作合作网络。一方面要吸引国际“网红”、环保人士来陕西实地探访，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扩大传播。另一方面要与国外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开发生态主题的数字内容。可以探索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外青年联合创作。四是深挖历史生态智慧。陕西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要通过现代传播手段让这些智慧焕发新光彩，展现陕西生态理念的历史传承。重点突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规律，用陕西故事印证这一真理。

这些举措要注重实效，避免形式主义，关键是要做到内容真实、形式新颖、传播精准，让陕西的生态故事真正打动国际受众。

4. 传播效能的科学评估

陕西在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做了什么，还应更重视实际效果。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是确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工作真正产生影响力的关键。

在传播效能评估创新方面，陕西的优势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科研基础扎实。省内高校集群覆盖生态学、传播学、信息技术等交叉学科，形成了完整的研究链条，能够对国际传播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为科学评估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二是国际反馈机制健全。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和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陕西拥有欧亚经济论坛等国际对话平台，建立了常态化的海外意见收集渠道，能够及时获取国际受众的真实反馈。最重要的是实践场景的多样性。陕西具有独特的“一省三区”自然地理格局，跨越了温带半干旱区、暖温带半湿润区和北亚热带湿润区三大气候带，地理形态上包含了黄土高原、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地三大地形单元。这种自然禀赋的多样性，使陕西的生态文明

实践同时涵盖了荒漠化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生态建设等不同类型的案例，形成了国内少有的完整生态治理谱系，为传播效能评估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这些条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评估闭环，科研力量提供分析工具，国际平台获取反馈数据，多样化的实践场景则验证不同传播策略的适用性。这种“三位一体”的优势，使陕西能够建立起科学的传播效能评估体系。

未来陕西应充分重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效能评估工作。首先要建设专业的监测系统，实时收集和分析国际社交媒体、学术期刊、国际组织文件中对陕西生态话题的讨论情况，通过大数据技术，准确把握传播效果的变化趋势。其次要建立定期发布制度，定期编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内容应覆盖国际关注度的变化、典型案例的传播效果、海外专家的评价反馈等，让数据成为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依据。最后要加强国际合作评估，可以邀请国际机构的专家参与评估工作，通过国际专家的视角，帮助我们发现传播中的不足，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不断提升传播工作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这些措施的实施，将帮助陕西更科学地评估传播效果，及时调整传播策略，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更加精准有效。同时，这套评估方法也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推动全国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工作水平的整体提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不仅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举措。它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经验，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历史轨迹深刻印证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发展规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今天的陕西，正在用生动的实践续写这一历史启示——从秦岭生态修复到黄土高原治理，从朱鹮保护到光伏治沙，这些创新实践既传承了传统生态智慧，又展现了现代治理创新，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素材。

面向未来，陕西应继续发挥历史文化与现代实践相结合的优势，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国际传播方式，为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毕秋（2024）：《〈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阐释及其时代价值》，《山东社会科学》第2期，第24—31页。
- 包庆德、冯超（2025）：《“民胞物与”：生存智慧其生态哲学向度解读》，《思想战线》第1期，第165—172页。
- 边江（2020）：《实施西部大开发 圣地延安大变化》，《西部大开发》第1期，第102—105页。
- 丁小斌、赵楠（2015）：《“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差异：来自基因、大脑的证据》，《心理与行为研究》第1期，第131—137页。
- 杜尚儒（2021）：《朱鹮：从秦岭飞向世界》，《新西部》第11期，第15—19页。
- 方光华、曹振明（2015）：《张载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15、21页。
- 葛晓伟（2021）：《金融机构参与气候投融资业务的实践困境与出路》，《西南金融》第6期，第85—96页。
- 耿纪永、王鑫（202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向度、叙事话语与实践指向》，《生态文明研究》第3期，第12—20页。
- 何建坤、滕飞、刘滨（2009）：《在公平原则下积极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47—53页。
- 姜晶晶、陈光耀（2021）：《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分析》，《中国金融》第20期，第83—84页。
- 李思齐、郇庆治（202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意涵、机遇与策略》，《生态文明研究》第5期，第15—23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3年度报告》，https://www.mee.gov.cn/ywgz/ycqhbh/wsqtzk/202310/t20231027_1044178.shtml。

王旬、庞心睿 (2024):《全球气候投融资进展及展望》,《金融纵横》第 5 期,第 31—36 页。
庄梓瑶 (2025):《欧美碳关税政策探析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国际商务财会》第 1 期,第 80—84 页。
张文 (2023):《生态文明的概念辨析与哲学反思》,《鄱阳湖学刊》第 4 期,第 16—24 页、第 125 页。
Chancel, L. (2022). Global carbon inequality over 1990–2019. *Nature Sustainability*, 11 (11), 931–938.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Shaanxi Practice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ZHOU Jun, GUO Jiro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anxi, 710049,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 integral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ystematically addresses the cruci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what ki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build and *how* to build it. This thought creatively integrates the Marxist view of ecolog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wisdom, profoundly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Chinese approach to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primarily focuses on interpreting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constructing its discourse system. There is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hways based on practical local experiences,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systematic excav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value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taking Shaanxi—a vital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as its foundation, explores the Shaanxi practice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t draws upon Shaanxi’s historical trajectory epitomized by “*Flourishing ecology leads to flourishing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practice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lourishing ecology leads to flourishing civilization; Shaanxi Practice

责任编辑：黄承梁